

# 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论坛：「北京论坛」会议综述

2012年11月8日至11日，由国际鲁迅研究会、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承办的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等的约50位学者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为“世界鲁迅与鲁迅世界：媒介、翻译与现代性书写”，本次会议首次集合了国内外的知名鲁迅研究者，是鲁迅研究的一次盛会，对鲁迅研究而言具有重大意义。会议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一、对鲁迅的再认识：

严家炎（北京大学）作了题为《鲁迅心目中艺术家的时代使命》的发言，严先生从鲁迅的两次演讲——《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展开论述。严先生认为，鲁迅心中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是要从事“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催促社会进化”，推动民主法治，对当政者尽到监督的责任。严先生通过举出一系列史实说道鲁迅并不只与国民党专制对立，与共产党之间也存在矛盾。最后严先生说，革命根据地同样需要启蒙，如果当年鲁迅所说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能够深入人心，那么就不会有后来惨痛的历史教训。

刘中树（吉林大学）作了题为《对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的再认识》的发言，刘中树认为将鲁迅定位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最完整和切实的评价。提出该定位评价问题是因为，一直以来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历史上对鲁迅的评价褒贬不一。进行鲁迅研究应从鲁迅活动的历史时代全面深刻的把握鲁迅的世界观、人生观、学术品行等一系列问题才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最后，刘先生提出了自己对鲁迅的定位，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解析。即1，鲁迅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为人生的改良人生和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和社会革命活动。2，改造国民性“立人”的民族复兴的蓝图和目标。3，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文学创作主见和成就。4，独立自主、爱憎分明、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自我解剖的人格以及“拿来主义”主张。

张钊贻（南阳理工大学）在《打倒“孔家店”的“摩登”圣人——鲁迅对孔子和儒家的复杂态度》中认为，首先，鲁迅对孔子及儒家并未彻底否定，相反还在不少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好感。并且，鲁迅的某些主张与儒家思想有契合。其次，鲁迅对《二十四孝图》的分析有褒有贬。对不合常理的“哭竹生笋”、“卧冰求鲤”等大加批判，从“诚”的角度揭露其虚伪和桎梏。再次，鲁迅对孔子和儒家的批判是经过历史分析的。他并

不是简单的反对儒家思想，他批判的目标是利用儒家谋取私利的“聪明人”，抨击那些尊孔者的虚伪性。最后指出，鲁迅不是完全赞同儒家的全部，有肯定也有批评。他认为儒家礼教是吃人的礼教；“聪明”已成儒家主流和“愚人”的不成气候，使得鲁迅对儒家理念和实践失望。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在《鲁迅对文学批评的另一种理解》的发言中认为，鲁迅眼中的批评有两种——作家的批评和理论家的批评。其中，理论家的批评又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中，又有“列宁主义”的和“非列宁主义”的。鲁迅欣赏作家的批评，而对理论家的批评，尤其是中国理论家的批评文字有些保留。针对“非列宁主义”的批评观，鲁迅也非常欣赏。同时，鲁迅的批评观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思想里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没有系统性，只是被压迫者觉醒后争取自由的精神的闪现，以革命者的身份追问历史追问文化。所以，鲁迅的“远离权力”的批评观，和后来权力影子下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批评观有本质的区别。简单地以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解释鲁迅，忽略鲁迅内心深处另一种批评观，就导致了对鲁迅片面性的解释。

鲍国华(天津师范大学)的《从学术史视角看鲁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从两个方面探讨鲁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一是对鲁迅学术研究的有效定位问题。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在西方小说的参照下，不固守西方小说概念，从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入手，探讨在中西交汇之间给中国的小说和小说史进行定位。二是鲁迅的学术文本在其文学世界中的地位。从鲁迅小说的创作时间看，《呐喊》到《彷徨》从题材、艺术处理上都出现明显的变化，在其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此可见，鲁迅的小说创作，支撑了其对小说艺术点评；对小说史的研究，反过来又促成其小说创作的变化。

## 二、鲁迅世界与现代性：

顾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鲁迅研究会顾问)《鲁迅的现实性》的发言，从文学性和现代性的角度对鲁迅作品进行了分析解读。重点分析了鲁迅作品中的声音问题。顾彬认为，鲁迅小说中的声音值得怀疑，从他小说中听到的并不是真正的鲁迅的声音，只是一个修辞格。顾彬将作品中的声音大致分为四类，即 1，真正的作者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不能全信，因为作者可以否定他自己的作品。2，叙述者的声音，例如《孔乙己》中的孩子。3，内在作者的声音，例如《孔乙己》中的孩子的声音是不可靠的，而应该寻找作者真正的声音。4，作品主人公的声音。并以“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为

例，具体分析了“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是一个孩子的声音，“所以至今还记得”是一个大人的声音。

汪晖（清华大学）的《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通过对《呐喊》自序的文本分析，以及对竹内好的对鲁迅的阐述进行分析来探讨鲁迅文学的诞生，认为自序作为回忆性散文并非纪实而是追忆，含有重构成分。汪晖认为鲁迅被动、内敛即鲁迅拥有“寂寞的能动性”与“呐喊的被动性”，随后探讨了鲁迅是通过对“异路”、“异地”与“别样的人们”的寻求开始了自己的“呐喊”的，同时质疑了鲁迅文学的起源是“幻灯片事件”，并认为鲁迅“反抗绝望的文学”与“乐观的文学”不同，他拒绝乐观主义并试图在宽广世界中探索通向未来的道路。

刘勇（北京师范大学）在《魔幻与现实——从鲁迅到莫言》的发言中将鲁迅与莫言联系在一起。刘勇谈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外学者就其作品究竟是以“魔幻”为主，还是以“现实”为主，产生了分歧。刘勇认为，问题的关键是，魔幻与现实、想象与历史，在文学中是同在的，从古到今，也是中国与西方共有的。文学中魔幻的应用在中国存在深刻的渊源——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五四作家、莫言等当代作家的作品都存在揭露现实、重构历史的双重取向，以及对魔幻想象等表现手法的多种探索。而在中国古代作品中，《世说新语》、《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也都表现了魔幻与现实之间的双重取向。这说明莫言并非照搬西方，而是深受中国固有的文学土壤的滋养。

在《文学与寻根》的发言中，王乾坤（华中科技大学）为对“寻根文学”做总体性判断，想到鲁迅是不是“寻根”文学家。王乾坤认为，鲁迅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寻根文学家，而是一个寻找终极着落点、寻找生命之根的文学家，并力图将其还原成一个民族的或宗法的东西。鲁迅拥有世界性的品格，鲁迅以其超越启蒙的态度有别于中国其他启蒙者，对“民主”、“科学”和“宗教”的态度也别具一格。这种别具一格也体现在鲁迅对“自由”的态度上，他看到了民主与自由天生的对立关系，因而与胡适等产生了质的区别。同时，鲁迅还具有“居间性”，他不会完全信任一种观念，也不对自己完全信任，时刻警惕自己与恶势力合谋的可能性。鲁迅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寻找民族的根。

李宝暉（江源大学）的《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纲领“救救孩子”——以优生学的角度来谈》从另一个角度对鲁迅的作品进行了解读。李女士认为正是因为鲁迅遭遇了“既非赞同，也无反对”的寂寞境地及其内面世界的对立即对历史的怀疑、对进化论的灭种恐怖或对中国现代化的怀疑导致了其“救救孩子”的命题中有一种忧郁的气氛。随后李女士又探讨鲁迅与优生

学的关系，介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接受优生学的背景。最后详细阐述了“适者被不适者吞噬”的现象在文本中的表现。并说明，鲁迅在接受优生学的过程中，对极端优生学保持警惕，主张优生学和命运论不可混为一谈。

金河林(朝鲜大学)在《鲁迅思维模式探究——以〈野草〉为中心》的发言中认为，鲁迅是一个主张抒情的诗人，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多方面的小说家与思想家。通过对文本的分析，金河林认为鲁迅的思维模式由三部分构成：以《狂人日记》为例，可见鲁迅既扩大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同时也深化对内部世界的认知；秉承传统文化矛盾的思维模式，对传统文化既传承，又批判；三角形构造小说模式——一个人、民众、社会。另外，鲁迅常采用二层对立的方法，如“青年与老人”、“希望与绝望”，这种对立有助于读者明确地把握作品内容与主题。

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的《论“五四”启蒙思想裂变的三种主要走向、原因及其巨大影响》认为“五四”退潮后形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革命、胡适为领袖的思想方法为主的思维及其工具的革命和鲁迅所坚守的思想革命三种走向。何锡章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他们分化与裂变的原因：他们当初并未按照中国传统的立足于具体利益的共同体原则结合在一起，自身也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团体主义”主义，其自身的思想特点也与传统文化脱离不了干系。最后探讨了阵营分化裂变的影响，重点论及消极影响即五四启蒙思想被打断而至今未能得到广泛有效的传播。

林曼叔(香港《文学评论》)的《鲁迅：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的风度及其命运》认为，鲁迅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深受西方学说和老庄哲学以及魏晋风度的熏陶相关。他是一个不受任何思想束缚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没有体系，自身也拒绝被纳入集团党派之中，而是选择不断探索前进。他与其他学者的论争也体现了其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特点。最后提出自由主义者的存在有赖于社会的开放与活跃，同样，自由主义的活跃也有助于社会的发展。

李怡(北京师范大学)在《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中认为鲁迅是现代中国研究绕不开的“结”。首先，鲁迅是一个“两级牵挂”，他不仅曾被国共两党争相赞颂、吹捧和利用，还曾被创造社、太阳社的青年、林语堂及八九十年代对鲁迅持怀疑态度的青年学者做出历史低谷的评价。其次，鲁迅自身有意成为历史绕不开的“结”。他在人格上的叛逆性、独立性和在文学创作上的自我“世故”的独立性都显示了这一点。最后，其作为现代文化之“结”的意义表现在中国思想的世纪性变迁、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理想与选择、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中国现代伦理观念、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坛的复杂纠缠关系等五个方面。

汤山土美子(日本成蹊大学)的《通过“孩子”相关的词汇再谈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特征与意义——〈狂人日记〉“吃人的世界”的结构与儿童观》认为“孩子”及其相关词汇是构成鲁迅思想的重要元素,对理解鲁迅而言有重大意义。然长久以来,人们只关注到了鲁迅对于民族未来的“孩子”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却并未关注“孩子”及其相关词汇所蕴含的思想性意义。文章从《狂人日记》入手,详细解析了“孩子”及其相关词汇在文本中的不同存在形态,对五四时期鲁迅的家族观及儿童观进行分析,从而析出鲁迅所说的“性别与辈份的等级制度”下中国的家族结构、以及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儿童的特征和意义,并对“孩子”的日文翻译提出了意见。

李林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发言《歧变与转向:鲁迅杂文写作的1926-1928》从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对鲁迅的写作进行了探讨。首先,介绍了写作这篇文章的方法论思考。其次,通过1926-1928年鲁迅杂文写作的整体概貌进行文本现象分析,以展示鲁迅的思想变化轨迹。再次,鲁迅的杂文体现了女师大风潮余波后对自我认同的回归,对破旧革命时代及其所带来的高潮和文学、文学现象之间的辩论关系,以及鲁迅与一部分狂飙社成员的彻底决裂等现象。最后认为,表面上鲁迅在这一时期的杂文写作显示了其从自由战士到左翼领袖的身份转变,但实际上,他仍然是精神界孤独的战斗。

夏可君(中国人民大学)的《鲁迅的〈野草〉与现代文学的草写性》认为《野草》体现了鲁迅独特的新的书写性,他创造性地转换了古代汉语,生成出一门新的白话文的新文字。夏可君认为鲁迅《野草》的书写性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语句三次打断的书写,而这种三次打断的书写,是为了传达个体的孤独感。即刻幻化的书写或者梦的书写,这种即刻幻化的书写,与个体的生命感受切身相关,与梦幻相关。图像-文字-事物三者贯通的书写。身体的书写。野草式书写。

田本相的《鲁迅的现代性》认为,鲁迅是近现代中国最早的现代性观念的传播者和倡导者。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立人”思想。鲁迅呼唤精神界的战士,讲求精神。

《文化偏至论》等著作都是突出体现。第二,小说的现代性——残酷的美。揭示对精神迫害的残酷性,揭示人的精神的悲剧性,如祥林嫂、闰土、阿Q等。第三,内在的矛盾与痛苦,《影的告别》即揭示了这种彷徨而未得的状态,这就是鲁迅甚至是五四知识分子的焦虑状态。第四,最能体现鲁迅现代性的即其批判精神和斗争精神,也就是现代性里面的否定性。

刘春勇(中国传媒大学)的《鲁迅:留白与虚妄》抓住了鲁迅文学创作的两点——留白与虚妄来探讨鲁迅的文学世界。刘春勇认为鲁迅在1925年就已经有了留白意识,其文章的写

法是一种反焦点的写作。关于虚妄，希望其实不是传统意义的希望，也不是绝望，而是虚妄。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虚妄的状态。

### 三、鲁迅与海外：

高利克（国际鲁迅研究会顾问）在《尤里乌斯·泽耶尔和鲁迅作品中的后羿：一项比较神话学的研究》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阐释了鲁迅的创作，比较了尤利乌斯·泽耶尔和鲁迅两位作家作品中的后羿形象之间的关系。高利克先生认为泽耶尔和鲁迅作品中的后羿形象分别取材于两个不同版本的民间神话传说中，他特别强调鲁迅笔下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鲁迅的历史小说是与现实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鲁迅当时在广州的时候与许广平的生活，包括我国的革命，这些构成了鲁迅历史小说中一些特殊的内涵。同时，高利克先生在论述中引用了很成功的材料，对《圣经》中的大胃王和中国古代编年史著作《左传》中的晋文公这两个重要的人物进行了全面的比较。

哈赛宁（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的《试论鲁迅和纳吉布·马哈福兹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样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探讨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他认为，鲁迅和纳吉布·马哈福兹分别作为中埃文学史上的大家，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描绘分析。文章详细分析比较了两人笔下的四类知识分子形象，即：传统知识分子形象；新生代知识分子形象；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女性知识分子形。哈赛宁认为两位作家成功的塑造了鲜活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时把知识分子的出路作为自己文学创作探索的重要方面，很巧妙的反映了两位文学家的民族性和对自己本民族人民的关注，体现了作家深切的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

藤井省三（东京大学）的《松本清张的初期小说〈父系之手指〉与鲁迅作品〈故乡〉——从贫困者“弃”乡的“私小说”到推理小说〈埋伏〉的展开》一文则将《父系之手指》（杂志第一版和单行本版本）、《埋伏》与佐藤春夫翻译的鲁迅的《故乡》进行了细致的文本间的比较、考察。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藤井省三认为私小说式清张作品《父系之手指》，将《故乡》的故事结构进行颠倒，站在相当于水生所代表的贫困者的人物视角，对相当于《故乡》中的叙事者“我”及“我”的侄儿宏儿所代表的富者进行了批判。这种反鲁迅，反《故乡》的主题最终成就了松本清张最早的推理小说《埋伏》。这种比较阅读不仅有助于分析清张文学从私小说转向推理小说的展开脉络，更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对《故乡》进行解读。

鲁迅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庄华兴（博特拉大学）的《六七十年代马新华文杂志中的鲁迅》就从 60、70 年代间的新马华文杂志中探讨鲁迅的思想补给如何为新马华人参与建国提供思想准备。在 60、70 年代的马来亚独立后建国时期，鲁迅的影响不仅在于其人格和精神的典范，其思想也催生了马来亚华人的民主与民权意识的萌芽。最后认为鲁迅的（民族）国家意识是民族主义的，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与排他性，这对海外离散华人寻求安身立命产生了借鉴与启示作用。并呼吁不能简单地以后殖民的视角看待鲁迅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而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鲁迅精神的实践性继承在东亚：以竹内好、李泳禧、钱理群为中心》则从鲁迅对东亚的影响的角度解读鲁迅。对日本的影响以竹内好为代表，对韩国的影响以李泳禧为代表，中国则以钱理群为代表，将受鲁迅影响的海外知识分子分为 7 个类型，并介绍了其中的四种类型——思想家型、作家型、研究家型和一般读者型。认为思想家型不仅接受鲁迅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还付诸实践，以李泳禧为例进行了详细介绍。并认为，韩国的知识分子历史与韩国的精神文化史可以从接受鲁迅的角度重新阐释。

同样，洪昔杓（梨花女子大学）的《金台俊的学问研究与日本人以及鲁迅》以韩国学者金台俊的著作《朝鲜小说史》为着入点，谈到金台俊在京城帝国大学学习的学习背景、创作《朝鲜小说史》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契机，进而分析金台俊与日本人、与鲁迅之间的学术关联。洪昔杓认为，金台俊写《朝鲜小说史》无疑受到了熟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学者辛岛骁所开中国戏曲与中国小说课程的影响。另外，金台俊发表的《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艺观》不仅积极地参考了日本人濂沼三郎的论文，而且更多地参考了中国的资料，并基本完成对鲁迅的理解，认为鲁迅已尽时效。最后，洪先生总结，从《朝鲜小说史》比较文学的视角看，从金台俊受熟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学者辛岛骁的影响看，《朝鲜小说史》不仅凝聚了金台俊的独立学术成就，也充分吸收了中日韩三方的学术成就。

与会学者不仅探讨了鲁迅对后人的影响更追溯了鲁迅所受到的来自他国的学者或思想的影响。林敏洁（南京师范大学）的《鲁迅与松本龟次郎》探讨了鲁迅与其日本老师之间的关系，她认为，旅居日本的 7 年时间里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是鲁迅后来获得伟大成就的原因之一，而其日文老师松本龟次郎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文章从介绍松本的生平着手，通过三个具体的事例求证了鲁迅与松本之间非单线的互相的影响关系。最后指出，鲁迅与松本龟次郎之间已经超越了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建设性的、相互影响的、教学相长的关系。

而陈漱渝（北京鲁迅博物馆）在《鲁迅的苏俄观》则探讨了鲁迅的苏俄观，他认为鲁迅的苏俄观在其后十年的思想创造中有着重要的影响。针对鲁迅的苏俄观，在以往研究中存在两种说法：一是向往说，即对苏俄的向往。二是质疑说，即对苏俄理想的幻灭和警觉。陈漱渝认为，鲁迅的苏俄观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回归到时代背景下，鲁迅对托洛斯基被枪毙等消息有一些了解，他认为人权的保障和生产力的解放这一理论是正确无疑的，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其次，鲁迅有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狭隘观。但是，鲁迅的人道主义精神令我们受益匪浅，当代人应向其学习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厚道、公正的写法。

蔡辉振（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做了题为《鲁迅数位博物馆之建置研究》的报告，以PPT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他建置鲁迅数位博物馆的初步成果。首先，蔡先生首先简单谈了建博物馆的原因，即希望通过建立博物馆以解决查找资料不便、扩大鲁迅影响的工作受阻的问题。在PPT上可以看到博物馆典雅古朴的页面设计，点开平台首页链接，可以看到一个详细清晰的网络地图，主要涉及鲁迅的照片、生平、事迹、年谱，鲁迅的作品，以及相关研究文献和读者留言、讨论三部分。蔡先生的这个项工作为鲁迅的研究和广大读者的阅读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陈建忠（台湾清华大学）在《论冷战年代里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的发言中认为，夏济安、夏志清作为冷战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意义是复杂的，其论述需要加以整理。首先，二战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的需要置于区域研究的脉络里重新加以理解。因为冷战学术的影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所以该成果与该基金会的倾向正面相关。第二，二夏其实是海外流亡离散论述的代表。二夏认为鲁迅并不是五四精神的代表，而是一个“病态的天才”，这是透过鲁迅谈论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一种方式。第三，二夏采用新批评的方式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肯定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而否定左翼文学和鲁迅。最后认为，在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处于冷战文化脉络里，受到了冷战学术思维的影响，缺乏自由自觉的主体性。

#### 四、关于鲁迅的翻译：

朱正（湖南人民出版社）在《谈鲁迅的翻译》的发言中认为，翻译在鲁迅的文学活动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鲁迅的创作受其翻译的影响很大，其文章中的有些话来自于翻译而并非自己最先提出来的。鲁迅是主张“直译的，朱正认为鲁迅的翻译达到了“信”的要求，但是“达”则出现了问题。所以，鲁迅虽是一名勤勉的翻译家，但是对他的翻译著作不能做过于肯定的评价。



寇志明（新南威尔士大学）在《翻译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源”文本和意译与直译的两难》中认为，《摩罗诗力说》中含有一些源于西方著作的引文，但是鲁迅并没有说明这些引文的出处，寇志明就如何找到原文本以及鲁迅的翻译与原文存在的明显出入，如何把原文清晰而准确的翻译成英文，以及鲁迅本人对原文本的理解进行了论述。

张中良（中国社科院）在《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中认为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自觉和文体独立及鲁迅自身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主要从三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首先讲到鲁迅翻译儿童文学的阶段进程。分别以 1903-1921 年、1922-1927 年和到上海后的九年间分别进行了论述。接下来张中良谈了鲁迅翻译儿童文学的选择眼光。他说，鲁迅的文本选择历程和世纪初到 30 年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进程完全契合，其选择翻译的儿童文学不仅可以体现童心童趣和人与自然和谐的作品，还表现出其社会性寄托。最后，张中良谈了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鲁迅不仅从儿童文学中借用了大量意象投入自己的作品，而且儿童文学自身也影响了鲁迅的创作，同时鲁迅对儿童文学形式的也有一些借用。

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在《20 世纪中国的普罗米修斯——鲁迅的译介工作》认为，鲁迅真正有意识的文学活动从译介工作开始。鲁迅的译介观念是，在引入和翻译外国文学的同时把中国的文学创作介绍给世界，引入西方的先进文化观念并把中国的精神文化成果传播到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其译介生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在日留学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直译、文笔古奥和选择弱小民族作品进行译介，其中直译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第二阶段是北京时期，这一时期鲁迅借翻译来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努力寻求建立中国新文学的新道路。第三阶段是鲁迅在上海时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后期则着力收纳新潮，脱离旧套，开始创造全新的中外文化交流局面。

## 五、鲁迅与左翼文艺：

解志熙（清华大学）的《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及左翼文学之分歧》通过史料进行分析，认为从周恩来和胡风在 1945 年 10 月重庆举行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周对胡有委婉的规劝，并认为胡风之所以“不大与人为善”是因为他的“仇恨”心态和“战斗”愿望，这种心态和愿望则不仅源于对鲁迅的性格气质的认同，也源于胡风的注重思想精神革命轻视社会政治革命。随后胡风发起了一场文坛整肃运动，“主观战斗

精神胜利法”也由此而产生。最后认为“胡风集团”冤案的成因与左翼文学运动的终结与为文艺斗争缺乏足够宽容自由的争论空间与和而不同的文化制度有关。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的《延安媒介与鲁迅——“鲁迅”与延安文艺的结缘及其他》梳理了鲁迅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引入影音的概念进入鲁迅研究领域。在中国，影音被诠释为文化基因，也有人直接界定为影音，是估量一个人价值的参照系。期刊、电讯、电视是考察鲁迅生前死后与媒介关联的重要途径，李继凯从中发现了三种关联：第一，“人为媒”——鲁迅的影音及其精神生命。鲁迅研究者就是人为媒的主要体现者，依赖研究者的坚守和阐释，鲁迅的影音才能得以彰显。第二，“在延安”——符号化、媒介化的鲁迅。通过鲁迅作品的编印、传播、阅读、研究及纪念活动可以看到鲁迅与媒介的密切关联及其影音力量的呈现。第三，“鲁莫言”——旧媒体与新媒体的力量。鲁迅与莫言的比较研究对中国文学、文化，乃至现当代文学专业，具有学科专业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阎晶明（《文艺报》）在《鲁迅为什么“颂萧”——谈鲁迅与萧伯纳访沪》的发言中认为鲁迅与萧伯纳之间仍有研究价值：萧伯纳访问中国与鲁迅等人在一起的八个小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力，超过迄今为止任何一个外国作家；鲁迅和萧伯纳在同一个时代、不同的地方所起的作用是相同即揭露虚伪；二者对诸多事物的看法非常一致，比如对于长城及对莎士比亚的看法。

在《重读〈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张业松（复旦大学）力求通过文本的细读和史料梳理达到分析鲁迅风格和鲁迅气氛的来源及内容的目的。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鲁迅在左联五烈士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反应及对事件的历史定位。二是鲁迅与五烈士的重要成员的个人关系。三是鲁迅个人思想的反思与表达，梳理了鲁迅在左联五烈士以及左翼问题上的立场。张业松认为鲁迅将这一事件扩大到整个中国进行思考——弱者、社会底层阶级、青年的被扼杀意味着国家的前途危机，由此，鲁迅的左转跟鲁迅的总体想象是密切相关的。

蔡震（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于细微处看历史——从鲁迅书账中的郭沫若著作说起》从郭沫若研究的角度看鲁郭二人的关系。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二者总是处于“笔墨相讪”的情境里，而从一些历史细节中可以看到二者不为人知的关系。蔡震认为鲁迅生前购买了郭沫若所有已经出版的古文字研究著作，这表明鲁迅看重郭沫若的古文字领域的研究，与郭沫若具有共同的学术兴趣，而不是为了与郭沫若打笔墨官司而买下这些书。由此可见，历史的真实，未必不存在于历史的细微末节处。

石天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组织化与非组织化——鲁迅的个体叙述对左联非组织化的意义》从思考个人和一个严密的党的结构之间的关系，一个结构对一个人的改变引申来思考鲁迅和“左联”之间的关系。石天强认为在一开始鲁迅是高于“左联”而存在的，随着“左联”的发展，出现的一些矛盾则因为瞿秋白的存在而得到了解决，这便是如何解决非党人士和党的组织之间的问题。而且，鲁迅是处于“左联”结构之外的保持个体独立的非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知识分子，石天强认为，这也是现代都市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基本生存方式。鲁迅的这种独立性使得自己在思考问题时不受制约，对“左联”也构成了制约并形成了双重领导体制。

## 六、鲁迅研究之研究：

在《论鲁迅及其研究出现的历史根源——关于鲁迅学的哲学追问》的发言中张梦阳（中国社科院）沿着何兆武先生的思路对鲁迅学进行了一番哲学的追问。有四个方面的追问，一：鲁迅值不值得研究？鲁迅毕生致力于对国民性的改造，这是他恒久的、普世的价值。知识分子应当抓住现在的机会，潜心研究，构建精神之塔，达到理性之界。二，应该以什么方法研究鲁迅？研究鲁迅不能将之偶像化，意识形态化。应打破旧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趋近鲁迅本体，汲取真谛和智慧。三：为什么要将鲁迅研究上升为鲁迅学？鲁迅学的性质是科学形态鲁迅研究的的学科化形态，学科化就是发扬求真求实的宗旨，使鲁迅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四：鲁迅学能够持续下去吗？鲁迅学能够作为非“显学”的形态持续下去，作鲁迅研究应保持边缘姿态。

黄侯兴（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鲁迅研究五十年》重点论及认为鲁迅与郭沫若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二者其实是两个时代的人，鲁迅思想的前瞻性、对社会人生的批判精神、理论与创作的深刻性是郭沫若无法达到的。鲁迅在五四时期不唱反帝爱国的主旋律，时常透露出反抗绝望的思想，但在郭沫若的作品中却充满了鲁迅作品中所没有的主观浪漫精神。这种区别与他们出身环境、个人经历相关。另外针对郭沫若作品中存在的问题，黄侯兴认为是因时代环境所迫，有其历史根源。最后，针对鲁迅与郭沫若的研究，黄侯兴希望专家学者不要带有褒贬色彩，要历史地、客观地、多角度地研究。

在《沈从文对鲁迅小说的相关论述》中，高恒文（天津师范大学）认为沈从文对鲁迅小说的论述和现在对鲁迅小说作品的定性不一样。沈从文将鲁迅的小说分为讽刺小说和抒情小说，并认为鲁迅真正优秀的小说是抒情小说，例如《故乡》，而对于《阿Q正传》等讽刺小说的评价不高。但沈从文对废名的小说评价却非常高，认为废名的小说在反映当时中国人民

的生活现状方面要高过鲁迅。对此，高恒文认为原因有二：一，沈从文的作品创作是要重建民族品德，而鲁迅的乡村小说里面勾画的世界都是丑恶的，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念大相径庭。二是沈从文个人非常欣赏废名这种不同于鲁迅讽刺小说的阐释方式，并且这种看法在京派作家中很普遍。

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的《人民文学版〈故事新编〉注释的若干问题》以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鲁迅全集》与 2006 年版单行本为主要依据来说明其中存在问题的注释高达 20% 之多。姚小鸥指出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技术性问题，如注释序号位置不当，引用文献断句不当，引用文献称名前后不一等等；第二是引用文献错误，文献解释错误，注释行文不准确等学术问题；第三是政治及学术文化理念造成的解说问题。并分别举出了实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葛涛（北京鲁迅博物馆）在《鲁迅编辑瞿秋白的文集时的几则集外文字考释》中提出鲁迅在编辑瞿秋白的文集的“编者释”应作为鲁迅的集外文字收录到《鲁迅全集》里。鲁迅对瞿秋白的翻译进行了编选形成了《海上书林》，并对瞿秋白的译文加了两个注释，并做了一个编者说明。所以，一些鲁迅的“编者释”应作为鲁迅的集外文字收录到《鲁迅全集》里，这样便可以更好的感知鲁迅。